

90

年代
中国市场消费战略

主 编 刘方棫 杨圣明
副主编 张少龙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九十年代中国市场消费战略

主 编 刘方械 杨圣明

副主编 张少龙

CD03\10



中财 B0033746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

号 425719

通号 7126/4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新登字(京)1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十年代中国市场消费战略/刘方斌,杨圣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
ISBN 7-301-02322-7

I. 九…

I. ①刘… ②杨…

Ⅱ. ①消费-市场-研究-中国-九十年代 ②市场-消费-研究-中国-九十年代

Ⅳ. F126.1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 印 者: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85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9.45 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二〇〇〇年在中国实现“小康”的消费战略	(20)
第一节 “小康”消费战略是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20)
第二节 “小康”生活的量化标准及其综合评价	(25)
第三节 市场消费是九十年代中国消费战略的 根本取向	(37)
第四节 确定消费战略的基本原则	(47)
第二章 我国消费战略的回顾与展望	(50)
第一节 贫困型消费向温饱型消费的转变	(50)
第二节 低消费的形成与后果	(54)
第三节 温饱型消费的逐步确立与发展	(59)
第四节 小康生活:2000 年的消费展望	(68)
第三章 我国消费主体行为演变特征	(77)
第一节 个体消费行为变化趋势	(77)
第二节 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状况分析	(87)
第三节 集团消费行为考察	(98)
第四章 消费战略中的人口问题	(108)
第一节 我国人口增长态势与生态、资源的 经济约束	(108)
第二节 人口数量增长对消费发展的制约	(117)
第三节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与消费	(124)
第四节 人口与消费关系的基本政策取向	(142)
第五章 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	(151)

第一节	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及变化趋势·····	(152)
第二节	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的历史特征·····	(162)
第三节	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协调产业结构 与消费结构·····	(173)
第六章	我国居民收入、消费、储蓄关系的分析·····	(182)
第一节	改革以来居民收入—消费—储蓄的动态 特征·····	(182)
第二节	影响居民收入—消费—储蓄行为的制度 分析·····	(191)
第三节	居民收入—消费—储蓄的政策选择·····	(200)
第七章	建立和完善消费与价格的新型关系·····	(203)
第一节	消费与价格的横向关系·····	(203)
第二节	消费与价格的纵向关系·····	(211)
第三节	改善消费与价格关系的对策·····	(218)
第八章	我国市场发育与消费·····	(224)
第一节	市场在满足和引导消费中的作用·····	(224)
第二节	市场与消费者主权·····	(235)
第三节	正确处理国内外市场的关系,实现 对消费的调节·····	(242)
第四节	我国消费品市场发育的问题与对策·····	(246)
第九章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比例的 选择·····	(257)
第一节	我国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历史 格局和特点·····	(257)
第二节	确定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原则和目标·····	(269)
第三节	实现合理积累消费比例的主要对策·····	(281)
第十章	提供科学的适度消费·····	(286)
第一节	适度消费的界定·····	(286)

第二节	“消费膨胀论”剖析·····	(289)
第三节	实现适度消费的主要对策·····	(299)
第十一章	消费的国际经验比较·····	(307)
第一节	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比较·····	(307)
第二节	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比较·····	(316)
第三节	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	(322)
第四节	国际比较的若干结论及政策建议·····	(329)
附 录	·····	(333)
后 记	·····	(360)

引言

(一)

我国九十年代在确立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模式以后,我们应制定、执行什么样的消费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应制定怎样的规范消费行为的原则与政策?我们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居民收入政策、价格政策、市场发育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应怎样取向?从国际经验的比较上看我们又具备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问题都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探讨并给予明晰的解释。北京大学经济系社会主义经济教研室的一部分同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一部分同志,在长达两年余的共同研讨中,相互切磋,得出了某些共识,把他们的研究心得和成果,分章分专题成书,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回答,并就教于广大读者、专家。

这里,我们不妨先从什么样的消费观才是最健全、最正确的消费观谈起。从纵向考察,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以英国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看重生产,认为一国发展的快慢决定于积累的多少,消费少积累就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就快,所以积累越多越好,消费越少越好,特别是奢侈性的消费是不可取的。这种理论反映了当时英国产业资本家积累资本的客观需要。与之相反,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潮代表西斯蒙第则认为生产固然重要,但消费更重要,消费决定和创造着生产。西斯蒙第认为斯密,李嘉图只论及“为生产而生产”,然而生产的先决条件是消费,解决不好消费问题,就会影响生产发展,那种“为生产而生产”的理论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而延缓,减轻经济危机的要害就是要看重消费,因此他提出消费制约和决定着生产的论断。这一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危机已经显现,小生产者出现两极分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庸俗学派的代表马尔萨斯牧师,在西斯蒙第观点的基础上试图论证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和财富增长的源泉是社会消费的不断增长,只有能够扩展社会消费的阶层才是社会财富增长的社会力量。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投入产出遵循的原则是贱买贵卖,但收支盈亏已在资产阶级总体成员之间抵销,他们没有收入剩余来追加消费,无力解脱社会商品销售的危机并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劳动者阶级所得的工资收入,只能抵偿劳动力的消耗,仅够其生活费用开支,没有剩余扩展社会消费,也解决不了社会商品的销售危机问题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贵族和僧侣阶级不从事生产却一味地消费,因而才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商品销售的危机和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所以说正是这个贵族僧侣阶级才真正创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显然这种“理论”的反动性、庸俗性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用更多笔墨一一批驳。但是马尔萨斯在这里确也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最敏感的要害——消费市场问题,从而重提了如何评价国民消费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古典学派的正确观点,借鉴了社会上争论中有用的论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消费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著名原理,提出:“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媒介”、“相互依存”、“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这里,“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① 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作了科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95—96页。

学的概括。首先,在一次循环中,生产是过程的起点,消费是过程的终点,是生产决定消费。因为:第一,没有生产给消费提供可消费的对象,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对象是生产创造出来的。第二,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方式,没有近代文明生产方式,就没有近代文明的消费方式。第三,生产创造着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对消费对象的需求。只有把产品创造出来了,才会产生对这些产品的大批量的需求。其次,马克思同时又辩证地指出消费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片面形式上的决定作用”。消费创造着生产:第一,消费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者主体。没有消费就没有活劳动,没有活劳动这个生产的主体,再生产就无法进行。第二,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消费这个目的,生产就没有对象,也就是盲目的。第三,没有消费,生产就不能得到最终的实现,没有消费,再生产就没有良性的运行。可以说生产中有消费,消费中有生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产把消费生产出来了,反之,通过消费又把生产产生出来了,两者间是贯通的。

消费机制在哪里?我认为消费是一国国民经济的显示器。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一次循环过程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消费集中体现了前三个环节的成果和效益,成果大不大,效益好不好,体现为消费大不大,消费水平高低如何,消费规模大小如何,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优化等。国际大气候中,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原因虽然复杂,但重要的一条是改革背离了生产力发展这一基础,不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生产上不去,消费也就上不来。当然“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优越性而被唾弃了。我们党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始终不懈地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轴和出发点,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搞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落脚于综合国力和人民消费水平的

提高。^①正如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②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博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

正是居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十多年经济稳定发展、市场繁荣、出口兴旺、人民生活改善的事实，国际人士也普遍赞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不会象前苏东国家那样轮番倒下去，而且还能坚持得更好。这一历史实践证明，正确处理生产同消费的关系，在国际共运的发展战略上它也是扩大我国影响、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关键。

消费不仅是显示器，显示宏观、微观经济运行的成果和经济制度有否成效，同时消费又是指示器，指导再生产的如何走向。消费虽是一次运行的终点，但从再生产的过程看，它又是下一次运行的先导。借助于它在运行中实现的信息反馈给再生产的决策部门，指导生产部门按照市场上的需求与价格变动的信息，调整投入与产出，改善经营方向、经营规模和产品结构、技术结构、投资结构。消费信息不仅对生产厂家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个国家计划，减少和克服再生产的盲目性，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我们要强调消费信息及其反馈作用对于完善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① 消费水平高低，不仅表现为人均占有的消费资料的多寡和吃穿住用行的改善程度，而且还落脚在人均预期寿命的长短上。消费的提高在于保存和发展自己，否则占有的消费资料再多也是没意义的。我国人民的预期寿命已上升至七十岁以上，城镇标准高于全国。其中上海是七十五岁，北京约为七十二岁，均高于美国纽约市。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23页，第310页。

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确立市场经济,不再是计划经济和有计划商品经济,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企业,不再是国家政府的行政附属物,而是一个从根本上完全独立化的经济实体和法人。企业产权行将走向市场化,而市场化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股份制。这就意味着国家和政府不再扮演经济主体的角色。企业不再能取得和指望政府的经营补贴和财税优惠,其经营决策、经营的利益已经落到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头上,企业家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责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们自己将是企业利益和经营决策的主体。而企业在自主经营决策中必须按照市场上的消费需求,规划自己的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以及产品开发方向,这是经营机制上的最突出的转变。

第二,消费信息及其反馈作用关系到企业的盈亏与兴衰。这在市场经济确立后更为明显。因为实行市场经济将比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高一筹、更胜一筹。一是它在经济运行中所采用的运行方式和手段不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结合,而是“市场经济和计划调节”的结合,这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明显地发生了主辅的位移;二是随着这种位移使进入市场的对象将不只是企业的产品,而且还有资金、技术、劳务、劳动力、证券产权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经济比商品经济更加发育和完善,它意味着有更多的对象进入市场从而达到市场“化”;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架平等效率的天平,它能够保证足够的效率,又能够保证真正的平等。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平等和效率不一定是半斤八两,在某种情况下应当突出效率,在某种情况下又可以突出平等,从而实现两者的最适度的结合。但在总体上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根据市场经济这些特点,不论微观还是宏观,企业与国家都将从根本上依照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绸缪生产要素的投向。靠行政的力量并通过指令性的国家计划实施的配置方式,证

明经济效率不高。而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的经济,它具有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它的激励机制,它依据统一的度量标准,激励企业的全体人员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强迫经营者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经营;二是市场经济的信息传递机制,它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涨落和供求的变化,使企业的经营者不断的去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生产组合和调整生产结构和规模,因而能够推动企业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不断提高;三是它的风险淘汰机制,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承担相应的责任,它使千百万企业都进入一个平等的起跑线,去寻求自己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科学地、合理地调配资源。根据优胜劣汰的规律,那些不断改善经营从而使生产要素和资源得到最合理配置的企业,成为竞争中的赢家。而那些破产企业,其生产要素将转为优胜企业经营和所有。

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者主权型经济,即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中,消费者是拥有发言权、选择权并起支配作用的一方。生产者只有听从消费者的意见和偏好才能在自主经营中和竞争中顺利发展。市场经济同时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通过消费市场信息受益的经济。消费者根据市场信息选购商品和服务,以最便宜的价格和支出取得自己需求上的最好的满足;而生产者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动和价格的涨落,准确地判断需求变化,调整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使之在不断优化中取得更多的收益。市场所体现的消费需求,更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出发点和目标,它是实现宏观合理配置资源和优化经济运行的枢纽点,也是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结合的交叉点。

第四,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将从生产—供给—销售—需求的运行顺序转变为消费需求—生产—供给—销售的运行顺序。

传统的计划经济中的运行秩序是:我计划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什么就卖什么,卖什么就消费什么。而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是“上帝”需要什么,你就得生产和销售什么。显然,把握住消费需求,

将需求信息准确地反馈给生产部门,并按照需求组织生产,就能使产品适销对路,使其使用价值和价值迅速实现。我国七十年代只有50%的产品符合市场需求、适销对路,另外的50%一半滞销、一半脱销。八十年代,随着改革的发展,对路产品已超过60%,说明以市场取向的改革已见成效。但是要更多地减少滞销和脱销的盲点,就必须深化改革,确立市场经济的运行顺序,优化资源配置,求得社会总供给吻合于社会的总需求。这里,使运行秩序得以改变的关键是要把计划和行政定价让位于按照市场规律定价。市场上各种交易对象的价格,真正循着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力量制定,才能调整着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并且避免了各种资源的消费和各种商品的滞销和脱销。

(二)

我们对消费机制的看重,是经历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建国以来的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曾一波三折。开始阶段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是轻视消费重视积累,或说重生产轻消费,计划积累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国际上的实践经验说明,消费率一般以不低于65%,不高于80%为宜。过低容易引发基建战线过长,经济效率降低,人民生活改善受到压抑。我国1959年、1978年消费率都低于65%,结果被迫进行了调整。在技术基础薄弱,人口众多,农产品商品率低,国民收入增长偏低情况下,长时期坚持较低消费率是不可取的。消费率偏低原因很多,一是极“左”路线的干扰,片面理解积累率愈高愈好;二是计划生育不到位,人口增长过快;三是我国第三产业滞后,社会保障系统跟不上发展需要,片面强调第二产业要多就业,导致我国就业过急、过快。但主要的还是在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即通过压缩消费来增加积累或维持高积累。

实践证明,消费对生产有积极的反作用,搞好人民的正常消费是取得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摆正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是再生产良性运行的先决条件。压缩正常的消费,而实现的高积累是不可能持久的,它不会带来经济的高速持续的发展;兼顾正常消费而实行的适度积累,则可能带来较高的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

当然,强调消费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消费可以离开生产的媒介,去绝对地鼓吹消费率愈高愈好,消费愈多愈好。消费率高于80%(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中)的比例,会降低必要的积累率,延缓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使今后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缺乏后劲和物质基础,使人民长远利益受到损害。科学的消费观和作法是强调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一是生产不要脱离消费,要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这个最终目的服务,要依赖消费的实现变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二是消费也不应超越生产对自己提出的原则界限:消费需求只能依赖物质生产求得不断满足,离开必需的物质基础,空谈改善生活是无济于事的;消费水平不宜提得太快,必须保证今天消费获得改善的同时还要兼顾到生产发展的需要,藉使明天的消费获得继续改善的物质基础。因此以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动力来自消费,就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拿来消费;以为把今天的消费水平提得愈高愈好、愈快愈好的看法,不符合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的原理,它同“为生产而生产”的主张一样,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幼稚病。总之,这两种倾向,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上是有害的,都应该避免。

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扭转了“重生产、轻消费”的历史偏见,国家在偿还人民生活“欠帐”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促进了改革与开放的势头。但改革开放的十五年来,也曾交替出现过消费超前和需求不足两种端倪,尽管它还没成为一种必然倾向,但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消费超前端倪主要表现为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率一度超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例如从1978—1987年,全国居民年均收入增长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约为11%,而同期按每个社会劳动者平均创造国民收入计算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仅增长5.4%左右。^①1988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500亿元)比1987年增长28%,但当年工业生产仅增长18%左右。社会需求大于全国工业生产的增长。^②加之连续几年的银行信贷投放过热过猛,货币流通量多年偏大,其增长速度约为工业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两倍,国家财政将增发的货币用于各种支出、转化为社会集团、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造成社会结余购买力迅速扩张。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膨胀增速更是凶猛。1980年以前其总额不足200亿元,1984年超过300亿元,1985及1986年都超过了400亿元,1987年又登峰造极高达553亿元。社会集团消费需求膨胀,扩大了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矛盾,增大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增加了市场压力,助长了社会攀比和奢侈浪费。尤为严重的是八十年代后期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并以两位数字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我保护”,纷纷向银行提款,抢购物资和消费商品,形成所谓“事出有因”的超前消费的端倪。

进入九十年代,在整顿治理阶段,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有效抑制,经济降温,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转趋平衡。但却又出现了商品滞销、市场疲软,库存积压、效益下降的新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出需求不足、生产难以启动的端倪。造成这一新局面的原因是:盲目引进、重复建设,各地产业结构趋同化,致使一些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产大于销;一些厂家产品粗制滥造、质量低下,过去曾在抢购风中看好的现在卖不动了,产品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跟不上市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88年8月9日第二版。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88年10月31日第二版。

场的变化与发展,长线产品生产压不下来,产品技术滞后,更新换代缓慢;消费者的工资收入受到一定控制,加之部分产品过分追求高档化、销价过高,城乡消费者承受力相对偏低,致使消费者望而却步;等等。

针对上述的问题,国家在继续整顿治理中,大力作了调整产品结构的工作,从我国城乡现有的消费结构特点,高收入与低收入不同层次需要,拓宽消费领域,扩展流通渠道。并根据市场消费信息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1992年市场萎缩和产品积压状况得到了全面缓解,工业产品的销售率已趋正常。由于地方政府扩大基建规模,新开工项目增加、各地新起的开发区增多,房地产业开发趋热,因而到1992年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超出7300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37%^①,需求不足已让位于需求拉动,导致国民经济以12%速度强劲增长。与经济升温的同时,1992年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其中生产资料上涨20%以上,消费品上涨5.3%,而大中城市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长了11%^②,加之银行信贷超常增长,因而一个新的通货膨胀潜在危险也在增长,势将促使储蓄率已上升到30%以上、拥有一万亿元购买力的消费者,采取扩大商品增购的势头;我国一九九四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将完全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同国际市场经济沟通联轨,较廉价的进口商品将源源进入国内市场,同时它必反过来在竞争中加速国内产品的技术改造和更新换代,因而可以预见:一个新的消费热,有可能在一九九四年中到来,一个需求拉动、攀比效应带动的超常消费,有可能成为超前的消费。

①② 《经济参考报》1993年1月13日,第一版。

(三)

“消费膨胀—需求不足—消费膨胀”并不是交替反复出现的客观必然。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将有助于我们控制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克服宏观调控上的失误。但是实行市场经济不是不要政府的管理和调节,宏观调控在传递市场信息、推广先进管理经验、制定科学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诱导企业健康发展上仍将起着主导作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政府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当然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外来成分。

首先,我认为应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统一性。过去我们在同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争论时,无疑应当特别强调市场机制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政府机制——行政“干预”(直接管理与经营)的缺陷及转变职能的必要性。现在在市场经济已明确作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并已弄清何种机制居基础性地位的条件下,我认为切不可忽视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而应强调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共融性与互补性,肯定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重要地位与能动作用。要防止片面的单由市场机制决定一切的观点。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功能缺陷的一种反映,它根源于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

第一,市场机制的核心——利益驱动机制不能解决好所有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也不能靠利益驱动得到根本解决。例如要防止和减少社会失业的问题,发展暂不盈利的新技术产业问题,防治环境污染和减少社会公害问题,等等。显然,这里都存在着某种投资风险障碍。尤其是文化、教育和基本卫生服务(包括医疗的教育体系),由于它们的社会效益更重于微观经济效益,不应以追逐盈利为其服务目的。因此,如果完全让经济利益去驱动它们